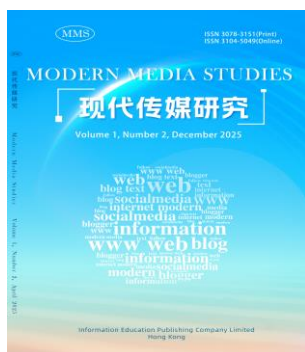




MMS

Modern Media Studies

MMS, Vol. 1, No. 1, 2025, pp.25-36.

Print ISSN: 3078-3151; Online ISSN: 3104-50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MS.25.1.03>



《中国学生周报》停刊之因研究

初瑛竺 (Chu Yingzhu), 凌逾 (Ling Yu)

摘要：《中国学生周报》由友联出版社创办，自1952年发行，直至1974年停刊，是20世纪50、60年代香港地区极受学生欢迎的报刊。学界目前关于此刊物的研究多种多样，然而这份坚守22年的报刊究竟为何停刊，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经研究，《周报》的停刊可归因为：资金链的断裂；深陷经营困局；与受众的期望产生落差；跟不上时代变化；竞争逐渐加剧。在现有研究相对匮乏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周报》的停刊原因，不仅能够揭示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运作困境与文化处境，也有助于拓展对香港报刊传媒变迁的理解，并为该刊物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中国学生周报》；友联出版社；亚洲基金会；编辑政策；社会变化

作者简介：初瑛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SophiaChu0311@163.com。凌逾（通讯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电邮：lingyu08@163.com。

Title: A Stud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bstract: Founded by Union Press, *The China Students Weekly* was published from 1952 until its discontinuation in 1974. It was a highly popular newspaper among studen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concerning this publication. However, the reasons for its discontinuation after 22 years of circulation require further analysis. The discontinuation of the *Weekl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break in the funding chain; being mired in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a discrepancy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its audience; failure to keep pace with changes in the times; and the gradual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vely limited existing research, re-examining the reasons fo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the *Weekly* not only reveals its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and cultural situation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but also helps to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Hong Kong's newspaper and media landscape. Moreover, it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on this publication and promotes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elated studies.

Keywords: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Union Press; Asia Foundation; Editorial Policy; Social Changes

Author Biography: **Chu Yingzhu**, Master's student,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Sophiachu0311@163.com. **Ling Yu**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lingyu08@163.com.

引言

《中国学生周报》（以下简称《周报》）创刊于1952年7月25日，结束于1974年7月20日，前后历经22年，共计出版1128期，是20世纪50、60年代香港地区极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学生刊物。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周报》的研究多种多样，然而这个“培育青年作者的摇篮”从一开始的一报难求到遗憾停刊，究竟为何消失，其缘由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已有研究《周报》的文章对停刊原因略有提及，如吴兆刚（2007）的硕士论文《五十年代<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研究》在探讨其文艺策略时，从读者、世界思潮和编辑策略三方面谈到《周报》丢失读者群的原因；庞浩贤（2020）的《负起时代责任：<中国学生周报>与“文化中国”在香港之建构》从社会思潮以及身份认同角度分析了《周报》为何失去青年读者的支持。以上两篇是在行文过程中较多谈及《周报》停刊的文章，然而，停刊原因在文中也仅仅是作为辅助因素，服务于文章的核心研究角度，其余研究《周报》的文章则未曾提及或只是简短几句话一笔带过有关《周报》的停刊动因。根据现有资料，曾供职于友联出版社和《周报》的工作人员对《周报》停刊的原因看法不一。因此，关于《周报》的停刊原因亟待进一步梳理和系统分析。本文立足于有文件记录的实质性资料，辅以口述性回忆访谈资料¹，尽可能全面地还原《周报》停刊的原因，为此后了解和研究《周报》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一、资金链的断裂：经济压力下的生存困境

《周报》由友联出版社创办发行，是该出版社旗下首份出版的刊物。友联出版社与其背后的资金支持是影响《周报》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友联出版社由1949年前后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年轻文人建立，创办时间大约在1949到1950年间，核心成员主要有陈濯生、史诚之、许冠三、孙述宪、燕归来、徐东滨、余德宽、司马长风等人。其中陈濯生、余德宽和徐东滨是《周报》创刊人，他们希望借助《周报》在香港展开文化保护与宣传，向海内外中国青年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家国责任感。1951年，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²在香港成立，对友联出版社注入资金并大力扶持。关于

¹ 指卢玮銮、熊志琴的《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和第二册，以及《博益月刊》的《中国学生周报》特辑等回忆性资料。

² 创建初期名称是亚洲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1954年更名为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全文统一使用亚洲基金会。

《周报》接受资金援助，郑树森（1998，p.4）谈到过，如果当时不接受援助的话，《周报》“恐怕早就夭折了，遑论日后的茁长壮大”。由此可以推断出，友联创办初期资金薄弱，自身营收状况并不好，《周报》不得已而选择接受援助。亚洲基金会的资金对友联及《周报》来说几乎一直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¹。也正是在此资金的协助下，《周报》能够得以顺利发扬光大，成为香港 20 世纪 50、60 年代盛极一时的刊物。具体而言，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对《周报》的帮助可分为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第一，对《周报》的创办提供了帮助。关于友联及《周报》如何与亚洲基金会搭上关系，何振亚认为是何羲均教授牵线搭桥，由何羲均介绍亚洲基金会跟友联认识。不过，他多次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猜测，没有准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卢玮銮、熊志琴，2014，p.33-34）。而针对亚洲基金何时对友联提供资助，大部分人的观点，即早期的友联经营惨淡，在 1950 年代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基金会才加以资助（黄子程，1998，p.129）。更为准确的结论则是来自傅葆石根据信件资料进行的总结。在 1952 年 5 月 4 日，燕归来致信亚洲基金会的第一任负责人艾伟（James Ivy）。在信中她提到两个建议，第一项建议是希望他（艾伟）优先考虑动员和支援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第二条建议是提议刊发一份学生周报，同时还提到了吸引学生志愿者帮助编辑和分销《周报》（傅葆石，2019，p.58）。随后于 1952 年 6 月 2 日，艾伟向总部转发燕归来的信件，提议帮助出版《周报》，且为此项目提供 500 美元的资助（傅葆石，2019，p.58）。在获得资助一个月后的 1952 年 7 月 20 日，友联就开始发行《周报》。从此可以看出，《周报》是在获得资助以后才得以发行。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亚洲基金会的资金注入，经营惨淡的友联在当时难以创办刊物，更遑论将刊物继续推广发扬。

其次，对《周报》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这首先体现在报纸价格的低廉。根据社内人士回忆，《周报》每年做好资金需求预算表，给亚洲基金会审核，基金会一般都会通过审批并下发资金。由亚洲基金会的内部文档可知，亚洲基金会也希望《周报》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发售，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购买和阅读。正因为此资金扶持，《周报》的定价十分亲民、低廉，可以快速融入以学生为受众目标的市场。从《周报》最初刊登的《本报征求基本订户优待办法》²可以得知，《周报》定价是半年（26 期）港币 3 元，全年（52 期）港币 6 元，以上价格均包含邮费在内。此外，如果学界集体订阅的话，还有七折或五折优惠。这种每份 1 角港币的价格为《周报》在香港迅速吸引读者、快速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创造了极大的有利条件。关于售价对销量的影响，还可以参考以下事件：当 1957 年亚洲基金会要求《周报》由 1 角港币涨至 2 角时，遭到了徐东滨等人的强烈反对。徐东滨认为涨价会让销售低迷的竞争刊物《青年乐园》反败为胜，这个理由最终也说服了基金会（傅葆石，2019，p.75）。据资料，在《周报》创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953 年，其销量达到了 12000 多份，到 1956 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30000 份左右（陈日青，1956）。这个销量除《周报》本身的内容吸引读者外，也与其低廉亲民的价格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次，亚洲基金会的艾伟也会帮忙传播《周报》，不仅要求新加坡协助调研，还亲自将《周报》寄送给亚洲各地的官员，希望他们帮忙传播这份刊物，推动《周报》销售。他认为协助《周报》“尽可能地扩大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的发行传播”，是亚洲基金会的重要使命之一（傅葆石，2019，p.72）。

第三，帮助《周报》的运营发展。除上文郑树森谈到接受援助的原因外，何振亚也谈到，“我们开始接触到 Asia Foundation，才慢慢有点规模，才开始经营”（卢玮銮、熊志琴，2014，p.25）。

《周报》获得的赞助费用是亚洲基金会赞助项目之冠，在 1955-1958 年间，每年都有 90000 港币的资助（王梅香，2020，p.127-130）。1960 年代末，由于经费短缺，亚洲基金会决定逐步退出对《周报》

¹ 在《香港文化众声道》中，何振亚、奚会璋、孙述宇等多位受访者均谈到该点。

² 首次出现于《中国学生周报》1952 年第 3 期第 4、1 版。

的赞助。基金会的最后一次资助是给了一笔钱，关于这笔资金的流向，有两种说法，王玄武称《周报》方面用这笔钱买了新蒲岗利森大厦的厂房以供自立自强（卢玮銮、熊志琴，2014，p.165）；林悦恒则说是设立了印刷厂（卢玮銮、熊志琴，2014，p.178）。不可否认，除巅峰时期外，在《周报》出版的大部分时间里，其销售额不足以做到自负盈亏，它的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亚洲基金会赞助的”（卢玮銮、熊志琴，2014，p.67）。在分配方面，“该笔钱是包括资助出版和活动的”（卢玮銮、熊志琴，2014，p.186）。这些经费不仅支持《周报》举办多种多样的例如篮球比赛、通讯员项目、歌咏会等活动，还会通过给予学生丰厚的奖金吸引学生参与《周报》举办的征文比赛等等。总而言之，《周报》在早期能够迅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亚洲基金会给予的支持脱不了关系。

到了 60 年代末期，亚洲基金会逐渐停止对《周报》的资金支持和协助，《周报》进入一个岌岌可危的态势。后陈任在 1973 年带资接手进行改革，但《周报》仍然不能自给自足。不过由于早期的未雨绸缪以及编辑的无私奉献，《周报》仍然独立自主运营了好几年，只是在反复不断的挣扎中，最后还是逃不过资金链断裂以后的休刊结局。可以说，在《周报》发展的前期，基金会资金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周报》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报刊，甚至一度成为亚洲“最受欢迎的学生出版物”（傅葆石，2019，p.74），在中期则帮助《周报》维护运营。然而，在基金会撤资以后的《周报》，则不可避免地因为资金短缺的问题而陷入运营僵局，最终导致停刊。在《周报》停刊以后，1970 年代的友联也在所难免地开始走下坡路，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减少，随之慢慢淡出公众视野。

二、深陷经营困局：管理模式与编辑的局限

对《周报》来说，没有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也是其停刊的一个原因。综合分析来看，后期《周报》深陷经营困局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缺乏企业化管理和经营以及后期编辑频繁变动、流失导致的编辑风格不稳定这两个方面。

（一）企业化管理与运营机制的不健全

《周报》的工作氛围十分宽松，但是其在初步稳定发行后、亟待专业化运营的时候，没有进行企业化的改革，这是导致《周报》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何振亚认为：“说企业文化什么，当时‘友联’有太多人爱谈政治文化，真正的业务没有太多人搞。这就是我们‘友联’真正的问题症结所在。”（卢玮銮、熊志琴，2014，p.20）总体而言，《周报》运营的不专业和不健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友联’的宗旨理念就是一些年轻人在一起”（卢玮銮、熊志琴，2014，p.11）。这群年轻人在一起，做事没有十分严格的标准，也没有复杂的工作流程，再加上亚洲基金会在大多数时间内是不干涉具体出版内容的，因此他们在工作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周报》的众多人士回忆加入友联的契机，答案大部分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者是在学生期间与编辑相熟以后，编辑热情邀约其来《周报》工作。这其中很多学生的编辑工作都是课余时间的兼职，直到毕业才转为全职。这说明《周报》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招聘考核制度，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考察，只是因为征文获奖等种种原因觉得合适，便把人招来尝试编辑报纸版面。这些个性迥异的编辑虽然让《周报》在内容的呈现上异彩纷呈，但是他们很难负责除编辑以外的事务，不能对《周报》进行商业化管理。不仅如此，根据何振亚回忆，友联和《周报》都没有年报，不会进行年度总结，甚至关于每期印刷数量，也是“他们喊一声下次印多少，都是临时决定的”（卢玮銮、熊志琴，2014，p.27）。以上种种都表明《周报》的管理缺乏专业人员，没有独立的部门负责规划《周报》的发展、运营、收支等工作。此外，广告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周报》也没有很好地利用此盈利点进行营收。翻阅

《周报》第一版的广告刊登条例¹，内容显示《周报》刊登广告的收费标准是：正面每二方寸收费三十元，里面每二方寸收费二十五元，长期刊登有七折优惠。此后《周报》针对广告收费标准进行了多次调整，价格变得越来越优惠，以此试图吸引更多的广告投资商。虽然《周报》成立了广告部门，但是在具体的筛选和刊载广告方面，一直如一潭死水一般，没有什么突破创新。罗卡接受访问时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表达了他作为参编人员对广告方面的不满：

“一九六〇年代中后期《周报》的势头这么强、影响力这么大，为什么总是只有那几种广告？墨水笔或原子笔，最厉害的就是奥米茄表、天梭表，每一期都是天梭表，抽奖也是天梭表 sponsor（赞助）的，另外就是打字学习社、补习班之类，没其他了。”

“青年学生用的东西很多呀，但总是只有那两三种广告。”

“我常常跟负责广告部的‘高佬赵’说，老是那几个广告，看着也厌了。”

“《周报》在广告方面开不了路，没有找专人或懂赚钱的人去做，否则以《周报》两万多份的销售额，在年轻人和学生中如此有影响力，一定可以建立广告客户的，没理由这么差劲。”（卢玮銮、熊志琴，2017，p.58）

翻阅《周报》每期的广告内容，情况与罗卡说的大体一致。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广告刊登种类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招生广告、打字学习社、补习班等几种内容贯穿始终。《周报》即使在销量鼎盛的时候也没有在广告方面取得很好的收入，孙述宇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那时候虽然说《周报》的销路相当好，但收入不多，没有广告，大概没有很多广告费”（卢玮銮、熊志琴，2014，p.133）。而随着后期《周报》销量的下跌，广告数量也是随之减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广告收入变得更少。

在《周报》销量逐渐下滑的时候，编辑部也没有想过去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宣传改善情况，吴平对此的回答是：“那时我们完全不懂做生意。”（卢玮銮、熊志琴，2017，p.100）后期读者自发展开“救亡”运动，为《周报》制作海报在街头张贴；陆离也曾想拯救《周报》，但她不知道怎么救；吴平作为当时的社长也想让《周报》重新焕发生机，但同样也是不知道如何转变。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周报》自始至终都是“随心所欲”的，一直没有企业化管理和运营。这就导致其在经营方面存在短板，缺乏长远的构思发展，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立自强。

（二）后期编辑的流失导致风格摇摆不定

前期的《周报》编辑很多，兼职全职都有，每个人负责不同的版面，不同年龄、思想的碰撞让《周报》各版面百花呈放。然而在1960年代后期，老牌编辑逐渐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周报》，这让本就在走下坡路的《周报》雪上加霜。在《周报》工作的薪资十分低廉，这是导致编辑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孙述宇谈到自己的薪金只有200元，陆离1972年离开《周报》的时候，薪金有600元，像史诚之、徐东滨等高层成员，薪金大概是230到250元左右（卢玮銮、熊志琴，2014，p.124）。在那个时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只是为了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大家是为了理想而工作，不计报酬，也不计自己的利益”（卢玮銮、熊志琴，2014，p.216）。在年轻时，尚且可以不谈回报、只为热爱，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不得不面对现实时，报酬不足的弊端就会逐步显现。罗卡谈自己离开《周报》的原因时表明，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就是薪酬太低。当时他同学的薪金都是1000元以上，只有他还是600元，“《周报》的薪金太少了，继续做下去的话，没有积

¹ 首次出现于《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第2期第4、1版。

蓄，连结婚、养家也不行”（卢玮銮、熊志琴，2017，p.55），甚至他的薪金都不足以支撑自己的工作。金钱上的困难让他不得不放弃在《周报》的工作，转而另谋生路。除此之外，比罗卡更晚离开的陆离还曾在《文林》和《香港影画》做兼职以补贴自己。在前期，编辑数量还很多，《周报》得以平稳运行，而到1960年代后期，随着《周报》的销量逐渐下降，编辑工作一度只有吴平和陆离苦苦坚守。而他们深感无法拯救逐渐走向没落的《周报》且十分疲惫、压力很大，最终吴平于1970到1971年间离任，陆离也在1972年离开。虽此后换陈任接手，许多编辑也义务为《周报》工作，尝试对报刊风格进行改变，但读者普遍都不太接受。最终调来调去，本来的编辑风格已面目全非，“《周报》后来转到以音乐和电影为主，转到比较前卫的艺术方面，通讯部办得不好，这是衰落的其中一个因素”（卢玮銮、熊志琴，2017，p.19），然而又没有更多的时间给《周报》的新风格站稳脚跟，“后期的《周报》摇摆不定，又增加流行音乐，又删去流行音乐；又改柯式印刷，又改回活版；又招人入股，又加价，又改为双周刊；又想与当前的生活艺术新潮互相招呼，又想潮流中有所坚持”（也斯，1988，p.107），最后在摇摆中导致其更加迷茫，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

三、与受众期望产生落差：忽略学生主体

前期的《周报》销量很好，吸引了一大批学生读者，这些初代读者陪伴了《周报》很多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这批读者逐步进入社会，鲜少再继续支持这一为青年学生量身打造的刊物。此时的《周报》亟需吸引新的学生群体加入读者阵营，然而《周报》未能做到成功转型以及吸引新读者。

首先，后期的《周报》活动渐渐减少，亦忽视与读者的交流沟通。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对比前期《周报》的专栏和相关活动加以体现。前期《周报》十分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交往，例如在第4期，应同学们的要求，《周报》宣布“通话站”建成，由燕望云负责主持，为同学们提供解答问题以及互通消息的园地（编者，1952）。随后“通话站”先后改名为“笔谈”和“大孩子信箱”，对学生生活、学习上的各种问题给予关注、回答和帮助。《周报》还曾开辟“读者通讯”栏目，用来回复学生来信，解决各种疑问。虽然该栏目只维持了短短的22期，但也体现出《周报》注重与学生群体的沟通。此外，《周报》在一周年的时候宣布组建“通讯员”制度，让报社变得学校化，以此组织学生、团结学生（余德宽，1953）。在1956年，《周报》的通讯员数量达到1400多名，香港一百多间中学，几乎每一间都有通讯员。这些通讯员不仅为《周报》出谋划策，同时还帮助售卖，为《周报》吸引读者和打开销路做出巨大贡献。《周报》还举行了多次征集读者意见的活动，以便了解学生喜好，并在读完来信和建议之后对读者进行集中回复，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求。其也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例如中学生篮球赛、话剧演出、学生征文比赛等等，极大程度地渗透进学生的日常和学习生活。可以说，正是《周报》与学生的频繁沟通，使得其能深入学生群体、迎合学生需求，从而获得学生的喜爱和拥护。但是后期《周报》因为资金、编辑的数量和精力不足等种种原因，取消了包括通讯员在内的各种活动，也很少刊登学生意见。这就使得其难以把握学生的新需求，与学生群体逐渐脱节。《周报》在后期自行其是地寻求新出路，但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与转型，最终难以吸引到新的读者资源，也面临原有读者流失的困境。

其次，《周报》的内容发生转变，对一些年纪较小的读者来说不太好理解，这也导致部分读者流失。进入20世纪60年代，本地青年加入报刊编辑行业，编辑的个人风格各有不同，《周报》相应地随之发生变革。此时期受时代潮流和部分读者的影响，编辑尝试引入世界文艺思潮，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文艺版和电影版上。在文艺版面上，编辑（1961）表示：“许多读者的意见表中，都要求本报多刊登和介绍现代文艺思潮。对这个建议，我们毫无异议的接受，今后，我们将在‘读书研

究’版，‘生活与思想’版与‘云艺’版有系统的介绍有关现代文学，哲学艺术等思潮。”这种编辑政策让这三个版面呈现出新的面貌，与之前的文艺路线明显不同。在电影版面上，1962年《周报》的电影版诞生，由罗卡主编，使《周报》在版面和内容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这些电影内容相对比较高深，羊城透露过可能编辑自己也看不懂，对于目标读者人群——中学生来说，更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羊城曾经尝试过让自己的学生阅读，最终的反馈是高中生还有点兴趣，低年级的则是根本看不懂（卢玮銮、熊志琴，2017，p.26）。罗卡自己也表示：“初中生不可能像我们那般喜欢电影的，看电影也不会看新浪潮，根本看不懂，你怎样说他们都不会懂。”（卢玮銮、熊志琴，2017，p.47）而对于这个转变，友联出版社董事曾对当时的主力编辑陆离（1963）表达过不满：“其实他们希望的路线是针对中学生的，因此常常对我们说文艺版太高深了，电影版太尖。”不过，因为当时的友联内部很混乱，无暇对此情况进行管理调整，便放任不管了。这种内容的转变虽然吸引了一大批大学生和职业学校的读者，又或者是对电影感兴趣的社会人士，但背离了“中学生”这个读者基础，动摇了读者根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了读者的流失。

不仅如此，《周报》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与学生的紧密联系到逐渐疏远，最终与学生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余德宽（1954）在《辽阔的想法 笨拙的作法——简答一位朋友的两项问题》中对“报社学校化”表达了满意的态度：“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正是我们报社最热闹的时候。喜欢音乐的同学可以到这里引吭高歌，爱好文艺的同学可以到这里来研究写作……”《周报》还设置了“学生之家”在编辑部大堂，每逢周末，学生就可以来玩，包括参加活动、听演讲、聚餐等等，学生甚至可以一整个周末都在里面。可以说，“报社学校化”为学生提供了一片放松自我、互相交流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中，学生与工作人员平等亲密相处，没有长幼之分和师生之别，无形中拉近了《周报》与同学之间的距离。不过，其后《周报》的发展却没有沿着这条准则继续，其与学生还是产生分歧，这从一件小事中可以窥探一二。《周报》在1958年、1959年举办了一些写作讲座，旨在帮助学生写作，提高文学兴趣，培养写作人才。讲座结束后，一群青年作者顺势创办阡陌文社，出版《阡陌》月刊，该文社十分受欢迎，存活时间很长。阡陌文社由《周报》的文学座谈会而生发，也寄生在《周报》，《周报》给予文社发展很大的支持。但在后期，《周报》工作人员下班后在编辑室内聚众赌博、玩扑克，被阡陌文社的学生告发后，《周报》的编辑便让阡陌文社搬离。从此件事中不仅能看出编辑的松散状态，亦可观察到编辑与学生之间关系的疏离与渐行渐远。此后由于经费原因，《周报》解散活动部，学生失去在《周报》的“根据地”，《周报》与学生的沟通也逐渐减少，最终不可避免地失去民心。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报》的成本逐渐提高，售价也从原来的一毛涨到两毛、到最后的三毛，价格越来越高，也难以吸引到新读者。后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流行音乐占据其他媒体主流，吸引了一大批的青年学生。陈任曾经尝试引进流行音乐，想跟上时代潮流，然而很多老读者又认为这不符合《周报》的形象，“很多人认为这是《周报》历史的‘耻辱期’，认为这阶段的《周报》媚俗，失却《周报》原有的精神”（李国威的挣扎——在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的“周报座谈会”的讲话，1988，p.147）。这种内容的改变致使《周报》的老读者不满，并导致其逐渐流失。《周报》在持续流失原有读者的同时，未能有效吸引新的读者群体，逐渐导致其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下降，使许多学生对其存在缺乏认知，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学生刊物存在。

四、跟不上时代变化：内容与创刊宗旨的格格不入

在《周报》第一期的创刊词《负起时代责任！》中，余英时（1952）写到：“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对时代负起责任……我们可以不受任何党派的干扰，不为任何政客所利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畅

所欲言，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讨论我们的一切问题.....只有在这种自由的园地里，才可以充分表现我们的意志，才可以充分阐扬我们的理想，才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从这里不难看出，《周报》强调独立自主、自由和理想，希望能在这里畅所欲言。然而，后期的《周报》未能真正践行自由民主的理念，偏离了其创办初衷，并且在内容取向上趋于回避社会议题，难以满足学生群体对社会认知与探讨的需求，这也导致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香港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社会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各类社会矛盾逐步显现，并催生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967 年发生的以游行、示威为主的“六七暴动”。在当时的香港社会，对殖民地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年轻人的力量一直在增长。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需求亦随之发生变化，他们怀抱高度的热情，渴望寻求表达与释放的途径。然而，由于友联及《周报》受制于殖民地政府和亚洲基金会，对于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并没有给予及时的报道和反馈，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谈文说艺，游离于状况之外，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就算有少数文章涉及对社会运动的议论，执笔立场也是站在政府方面，与学生群体处于对立面。具体而言，友联及《周报》所有活动都需要在香港政府注册，并且遵循相关的条例规定。《周报》也设有督印人职务，对刊登内容负责的同时受政府监督。一旦刊物内容出现涉及反殖民地政府等“违规”内容，政治部便会叫督印人去谈话，亦或是从根本上禁止刊登。加之亚洲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与香港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其官员会定期与香港总督或政治人员、警察会面，寻求共识与支持。亚洲基金会还规定：“出版物必须接受来自亚洲基金会代表们关于杂志内容和行政事务的建议。”（傅葆石，2019，p.71）在这些条件的束缚下，友联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场运动的，他们认为“这问题目前不宜讨论，当下首要是 Pro-government（支持政府），一定要帮政府，事情平定后才讨论”（卢玮銮、熊志琴，2017，p.76）。对于罗卡来说，他明显感受到：“那时已经没空间讨论.....友联的立场很强硬，有些地方不能讨论了，这是一个问题。”

（卢玮銮、熊志琴，2017，p.76）可以说，“《周报》在 1970 年代之前几乎从未与殖民政府（或广而言之——殖民主义）产生冲突”（傅葆石，2019，p.70）。因此，《周报》没有立场和条件深入剖析和谈论这些反殖民地政府等一系列社会话题，不能给予学生阵后支持，只能采取逃避和打擦边球的方式“苟且”，这无疑加剧了学生对《周报》的失望和不满。其后香港于 1970 年开始“保钓爱国运动”，这个运动又相继引发香港的其他运动，然而《周报》仍然没有任何改变，陆离表示：“一大堆问题涌过来，许多人在讨论，读者便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卢玮銮、熊志琴，2017，p.135）对此，傅葆石（2019，p.79）认为，《周报》在这段“躁动不安的转折期”内陷入瓶颈，并评价：“面对香港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and 经济不公，《周报》却不愿改变空言民主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做法。”《周报》在这些社会运动上没有有效回应读者的需求和期待，最终导致《周报》成为香港社会的“圈外人”，成为香港社会的“他者”。

其次，根据创刊词，《周报》的宗旨是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成一股重塑中国的力量”（余英时，1952，第 1 期第 1 版），建设一个文化中国。陈特也谈过《周报》的目标，即“希望《周报》就像‘五四运动’那样产生一个文化上的浪潮，我们想培育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感情”（黄子程，1988，p.125-131）。然而，这一宗旨与目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香港已难以契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其忽视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及思潮的演进，在读者影响力及实际践行层面均面临诸多挑战。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接触减少，再加上殖民地政府采取一些政策安抚民心，当时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巨变。“至六、七十年代，那些在战后香港出生、成长的年青一代开始与上一代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不仅仅是代沟而是在一代与二代间，那思潮改变太大了。”（冼玉仪，1955，p.88-89）这些“新生”青年不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南来文人，他们没有在内地生活的记忆，对内地只有全然陌生或不太熟悉。他们的“我城”意识崛起，思想上不再是

上一代人的“此地他乡”，而是当下的“此地此乡”。至1970年代初，香港民众对于香港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大大提升，香港本土意识和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论述已经形成（谢均才，2002，p.27）。因此，青年读者变得不太接受《周报》透露出的思想。更进一步说，由于思想内容的转变，新一代的香港青年对《周报》致力于传播的中华历史、传统文化都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共鸣，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周报》对于读者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身份认同思潮没有进行及时的适应和调整，在此期间刊登的文章并不能吸引新一代香港读者的兴趣，导致其逐渐失去了文化引领的地位，沦为社会边缘化的刊物，销量亦迅速大幅下降。对此，赵稀方（2019，p.274）曾评价：“在60、70年代本土文化崛起以后，‘友联’和《中国学生周报》就跟不上时代步伐了，终于被香港人抛弃。”

总之，《周报》对于社会运动和思潮的转变都没有进行及时的调整，所以在香港学生运动越来越活跃、学生思想进入全新阶段的时候，“作为解放前文化传统代表的《周报》，既不能变，亦不会变，便只有倒闭一个途径”（陈文鸿，1988，p.120）。

五、竞争逐渐加剧：多元媒介环境下的生存博弈

1950年代初，香港被形容为“文化沙漠”，可供阅读的刊物不多，娱乐活动也不足。《周报》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给香港文坛带来了新气象。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十分需要这种刊物，《周报》不仅迎合了学生的需求，还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周报》可谓是“一家独大”。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类新兴刊物逐渐崛起，逐步对《周报》的地位构成挑战与威胁，分流了大量读者群体，这也是导致《周报》逐渐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些刊物中，与《周报》竞争、被谈论最多的是左派刊物《青年乐园》。不过与《周报》一骑绝尘的销量比起来，《青年乐园》的竞争力在初期并未构成威胁。罗卡直言：“那时候对《青年乐园》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看法……当年实在不拿它当一回事。”（卢玮銮、熊志琴，2017，p.60-61）不过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两者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且立场很分明。《周报》站在香港政府一边，鼓吹和平安定繁荣，《青年乐园》则是高举反帝反殖民旗帜，这在当时导致了不同立场读者的争夺，进而加剧了两刊物之间的竞争态势。随着香港的思想和文化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接续出现了其他多种多样、具有竞争力的刊物。例如在1965年创刊的《当代文艺》和《小说文艺》、1966年创刊的《文艺伴侣》、1967年创刊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纯文学》等等，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为读者提供多种选择，这一情况也削弱了《周报》的竞争力。以上刊物都有自己的特色，报刊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场面。此时还有一些刊物对标《周报》，与《周报》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本文着重谈两份刊物，首先是与《周报》形成互补关系的《香港青年周报》。该刊物由《周报》原来的读者和投稿者——崑南于1967年创办，目的是吸引香港青年关注香港，宣传香港文化。罗卡认为，《香港青年周报》弥补了《周报》的不足，在电影、音乐和流行文化方面涉及颇多，“我们看到它搞出局面，挑战了《周报》，补充了《周报》所缺的部分”（卢玮銮、熊志琴，2017，p.61）。而且《香港青年周报》谈论起来这些内容，文笔比较轻松，对比《周报》不那么谨慎、保守，正合乎年轻人的需要。这造成很多不能被《周报》吸引的读者，转而被《香港青年周报》吸收。另一份是直接借鉴《周报》专栏和内容的《中报周刊》。该刊物在内容与排版上与《周报》十分相似，它的电影版和文艺版也抢去很多读者，“可以说是看着《周报》，直接抢《周报》的读者”（卢玮銮、熊志琴，2017，p.63）。此外，正如前文所说，当《周报》与学生、社会脱节，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时，许多文人便采取自己创办刊物的方式宣扬理想。“六〇年代另一个特色是有不少以政治、社会问题为主亦兼介思潮的杂志如《明报月刊》、《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盘古》等创办。”（也斯，1998，p.3）时代环境的碰撞催生出这些刊物，它们在当时积极发言，追寻社会热点，对学生群体产生较大吸引力。再者学生还会自发创办文社、自费印刷刊物，进而自办杂志。此外，《周报》原本具有吸引力的学

生活动，其他刊物亦纷纷效仿，甚至香港政府为稳定民心，也举办了一系列面向青年的社交活动，如舞会等。随着香港文化的日益多元化，针对学生群体的有吸引力的刊物逐渐增多，《周报》在此背景下的竞争力大幅下降。

对于《周报》甚至整个纸媒刊物来说，媒介的发展变化也会导致读者流失。20世纪60年代末，黑白电视开始普及，因此读者接触和获取信息的途径便不止纸媒一种，其他媒体形式开始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到了70年代，香港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十分开放，年轻人的兴趣也随之多样，不局限于读报和写作。“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那时的人已经开始不读书了，有空便看电视，很多其他娱乐，结果他们关心的只有流行音乐、pop stars（流行明星）的新闻，《周报》便衰落很快了。”（卢玮銮、熊志琴，2017，p.241）而流行音乐正是《周报》不擅长的部分，《周报》在音乐介绍方面是偏向正统而非流行乐，这与年轻人的兴趣背道而驰，自然讨不到读者的欢心。从内容上的改变可以看出《周报》在后期的挣扎，然而其最终不但没有与新媒介或其他刊物分得一杯羹，反而是引发老读者的强烈不满，可谓得不偿失。

结语

在1973年，第1110期的《周报》宣布改版（编者，1973），从周刊改为双周刊，读者和编辑都呼吁众人购买，试图拯救这份承载一代人记忆的刊物。但是最终在1974年，《周报》永远地停在了第1128期。《周报》的结束并不是一种原因导致，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叉作用的结果。《周报》的诞生得益于前期的资金援助，资金援助也帮助其在20世纪50年代快速抢占市场，扩大了销路，保障了运营。而后期亚洲基金会撤资以后，《周报》未能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不能做到自立自强。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周报》的“难言之隐”导致其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逐渐与时代脱节，从而失去大量读者。再加上《周报》的改版不尽人意，以及很多新刊物的涌现，外加新媒介的兴起，《周报》吸引不到新读者，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可以说，《周报》的出现是时代环境的使然，它的停刊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在22年中为香港培养了众多的文学家，是一代作家成长的“摇篮”，最终停刊以后仍可以在《四季》《大拇指》¹等刊物上看到它的余晖，可谓影响深远。研究《周报》的停刊，其意义不仅限于报刊自身的消亡，更在于其揭示了香港文化、社会环境、读者兴趣爱好以及副刊文学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作为一份主要面向青少年学生的刊物，《周报》长期以来在文化教育与社会认同塑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其于20世纪70年代的停刊，不仅意味着彼时香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也表明年轻一代对文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这一现象还反映了读者获取信息方式的更替、读者兴趣爱好的转变以及新兴媒介的发展对传统纸媒的冲击。从副刊文学的角度来讲，副刊文学曾是香港文学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纸媒的式微，副刊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作为培养新生作家的重要刊物，《周报》的停刊意味着香港作家发表作品以及获取创作经验的平台减少，进而影响了香港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和培育路径。这提示我们，在传统副刊逐渐衰落的背景下，香港文学和作家群体需要新的媒介生态下找到新的表达空间，及时做出适应时代与读者需求的调整。通过对《周报》停刊原因的系统分析，本文亦希望能够为仍在坚守发行的文学刊物及副刊提供借鉴，使副刊文学在现代媒介环境下能够得以存续，并持续发挥其对香港文学的独特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1949-2022）”

¹ 关于《四季》和《大拇指》对《周报》的继承和发展，详见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82-391页。

（项目编号：22&ZD27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编者（1952年8月15日）：“为同学们服务 通话站修建完成 特请燕望云小姐主持 希望大家提出问题来”，《中国学生周报》(04)，第1版。
- [Editor (1952, August 15). “Serving Our Classmates, The Communication St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Special Invitation to Ms. Yan Wangyun to Host, We Welcome Everyone to Raise Questions.”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04), Section 1.]
- 编者（1961年6月23日）：“保持本报一贯编辑方针 思想、学术、文艺、趣味并重 各版重新调整 增强内容·力求完善”，《中国学生周报》(466)，第2版。
- [Editor (1961, June 23). “Consistent with Our Newspaper's Long-standing Editorial Policy, We Emphasize a Balance Between Ideology, Academics, Literature and Art, and Entertainment. with Renewed Adjustments to Each Section, We Have Enriched Our Content and Strive for Perfection.”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466), Section 2.]
- 编者（1961年10月26日）：“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周报改版了！”，《中国学生周报》(1110)，第8版。
- [Editor (1961, October 26). “It's Both Bad News and Good News,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Has Undergone a Revamp!”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1110), Section 8.]
- 陈日青（1956年7月27日）：“使命重大 努力不懈”，《中国学生周报》(210)，第1版。
- [Chen Riqing (1956, July 27). “The Mission Is Significant, and Efforts Must Be Relentless.”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210), Section 1.]
- 陈文鸿（1988年10月15日）：“落后于社会变迁——谈《周报》的‘政治观’”，《博益月刊》(14): 119-121。
- [Chen Wenhong (1988, October 15). “Lagging Behind Social Change: A Discussion on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Bo Yi Monthly* (14):119-121.]
- 傅葆石（2019年6月）：“文化冷战在香港：《中国学生周报》与亚洲基金会，1950-1970(上)”，《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73): 47-62。
- [Fu Baoshi (2019, June). “Cultural Cold War 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nd the Asia Foundation, 1950-1970(Volume One).” *Bimonthly Magazine of the 21st Century* (173): 47-62.]
- 傅葆石（2019年8月）：“文化冷战在香港：《中国学生周报》与亚洲基金会，1950-1970(下)”，《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74): 67-82。
- [Fu Baoshi (2019, August). “Cultural Cold War 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nd the Asia Foundation, 1950-1970(Volume Two).” *Bimonthly Magazine of the 21st Century* (174): 67-82.]
- 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1998）：《追迹香港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
- [Huang Jichi, Lu Weiluan, Zheng Shusen (1998). *Tracing Hong Kong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黄子程（1988年10月15日）主访：“《周报》社长——陈特漫谈周报历史”，《博益月刊》(14): 125-131。
- [Huang Zicheng (1988, October 15).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President—Chen Te Casual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Bo Yi Monthly*(14):125-131.]
- “李国威的挣扎——在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的‘周报座谈会’的讲话”（1988年10月15日），《博益月刊》(14): 147-149。
- [Li Guowei's Struggle—A Speech at the “Weekly Newspaper Symposium” Host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Promotion Center(1988, October 15). *Bo Yi Monthly*(14):147-149.]
- 陆离（1963年2月8日）：“大地诗人佛洛斯特”，《中国学生周报》(551)，第1版。
- [Lu Li (1963, February 15). “The Earthbound Poet: Robert Frost.”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551), Section 1.]
- 卢玮銮，熊志琴（2024）：《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 [Lu Weiluan & Xiong Zhiqin (2014). *Diverse Voices in Hong Kong Culture (Volume 1)*. Joint Publishing (H.K.) Ltd.]

卢玮銮, 熊志琴 (2017): 《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二册)》。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Lu Weiluan & Xiong Zhiqin (2017). *Diverse Voices in Hong Kong Culture (Volume 2)*. Joint Publishing (H.K.) Ltd.]

庞浩贤 (2020): 《负起时代责任: <中国学生周报>与“文化中国”在香港之建构》。香港浸会大学哲学系, 香港。

[Pong Haoxian (2020). *Answering the Call of Our Time: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hina” in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吴兆刚 (2007): 《五十年代<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研究》。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 香港。

[Wu zhaogang (2007).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Edition of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n the 1950s*.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冼玉仪 (1955): “六十年代历史概览”, 田迈修主编: 《香港六十年代: 身份, 文化认同与设计》, 香港艺术中心: 88-89。

[Xian Yuyi (1955). “Overview of the 1960s History.” In Tian Maixiu (Ed.), *Hong Kong in the 1960s: Identity,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Design*, Hong Kong Arts Centre:88-89.]

谢均才 (2002): “历史视野下的香港社会”, 谢均才主编: 《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时间: 香港社会新编》, 牛津大学出版社: 27。

[Xie Juncai (2002). “Hong Kong Societ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Xie Juncai (Ed.), *Our Place, Our Time: A New Anthology of Hong Kong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7.]

也斯 (1988年10月15日): “解读一个神话? ——试谈《中国学生周报》”, 《博益月刊》(14): 103-109。

[Ye Si (1988, October 15). “Interpreting a Myth? —A Discussion on ‘Chinese Student Weekly’”. *Bo Yi Monthly* (14):103-109.]

也斯 (1998): “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化与香港小说”, 《香港短篇小说选》,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17。

[Ye Si (1988). “Hong Kong Culture and Hong Kong Novels in the 1960s.” In *A Selection of Hong Kong Short Stories*, Tiandi Publishing Co., Ltd:1-17.]

余德宽(1953年7月24日): “漫长的行程——致敬读者、作者和关心本报的朋友们”, 《中国学生周报》(53), 第1版。

[Yu Dekuan (1953, July 24). “A Lengthy Journey - A Tribute to Our Readers, Authors, and Friends Who Care About Our Newspaper.”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53), Section 1.]

余德宽 (1954年7月23日): “辽阔的想法笨拙的作法——简答一位朋友的两项问题”, 《中国学生周报》(105), 第1版。

[Yu Dekuan (1954, July 23). “Impractical Ideas, Clumsy Execution - A Brief Reply to Two Questions from a Friend.”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105), Section 1.]

余英时 (1952年7月25日): “负起时代责任!”, 《中国学生周报》(01), 第1版。

[Yu Yingshi (1952, July 25).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imes!”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01), Section 1.]

赵稀方 (2019): 《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Zhao Xifang (2019). *Press Hong Kong: Historical context and literary field*. Joint Publishing (H.K.) Ltd.